

# 论古代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文类之混杂<sup>\*</sup>

王庆华

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,上海,200241)

**摘要:**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,“小说”文类观的确立,经历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三座里程碑。在此过程中,“小说”作为一种文类概念,其内涵和指称也经历了一个由“子之末”到“史之余”的演化过程。由此,“小说”既易与“传记”文类相混杂,又易与“杂史”混杂。比较而言,从“小说”起源来说,它更易与“传记”而非“杂史”混杂。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混杂主要表现为历代公私书目中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混杂著录和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类作品部分内容的属杂。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文类混杂主要源于两者同属有别于正史的野史稗史,均为载录闻见或传闻而成,在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之琐细轶事方面存在交集。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“小说”所记“琐闻佚事”过于琐细,多无关“朝政军国”,无关“善善恶恶”之史家旨趣。

**关键词:**小说;杂史;混杂;相通;区分

**DOI:** 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15.05.020

“小说”与史部之“杂史”容易混淆,<sup>①</sup>“莫谬乱于史,盖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,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。”<sup>②</sup>“纪录杂事之书,小说与杂史,最易相淆。”<sup>③</sup>然而,作为不同的文类,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文类规定性。<sup>④</sup>对于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文类的混淆和区分情况,前人研究虽有所提及,但缺乏全面系统的清理分析,本文试图以回归还原思路,全面梳理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文类混淆现象,以此为出发点,深入分析两者文类规定性之间的相通联系,探讨厘清两者在文类规定性上的相互区分。

—

以史书艺文志为标志,“小说”文类观的确立,经历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三座里程碑,在此过程中,“小说”作为一种文类概念,其内涵和指称也经历了一个由“子之末”到“史之余”的演化过程。至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确立起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的义界,其主体主要指志怪、杂记、传奇等叙事类作品。<sup>⑤</sup>在“子之末”到“史之余”的演化过程中,最具标志性的是有一部分作品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杂史”“杂传”类划归到了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小说家”。这正如明代陈言《颍水遗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”(11&ZD106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,“小说”一辞歧义丛生,主要有:“小说”是“小道”,无关于政教,此为先秦两汉时期确立的最早的“小说”文类观;“小说”是野史、传说,有别于正史;“小说”作为一个口头伎艺名称,指称民间发展起来的“说话”伎艺;在明清通俗小说中,“小说”确立了“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”的内涵;近代,“小说”的指称对象又进一步泛化,实际上涵盖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外的弹词宝卷、杂剧传奇等多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文体。(详见谭帆、王庆华:《“小说”考》,《文学评论》2011年第6期)本文所谓“小说”,主要指古代文言小说,以历代公私书目著录之“小说家”为主体。所谓“杂史”,主要指史部之类目概念,以历代公私书目著录之“杂史”为主体。

② [元]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648页。

③ [清]永瑆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204页。

④ 本文之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主要作为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的一种类别,包含多种文体形式,如“小说”有笔记体、传奇体(或传记体)等,“杂史”有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、传记体、笔记体等,故以“文类”称之。

⑤ 详见拙文《由“子之末”到“史之余”——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》,《海南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期。

编·说史中》所言:“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,杂史之流而为类书、为小说、为家传也。”<sup>①</sup>此处“杂史”应为广义,包括“正史”之外的杂史、杂传等。实际上,并未有著作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杂史”直接划归到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小说家”,而仅有《汲冢琐语》、王嘉《拾遗记》等极个别唐前著作在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之后的公私书目中被归入“小说家”。相对而言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划归到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小说家”主要为“杂传”类作品。因此,实际上,从“杂史”与“小说”起源发生的联系来看,远不如“传记”密切。

古代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混杂现象主要表现为历代公私书目中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混杂著录和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类作品部分内容的孱杂。

唐以降历代公私书目著录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存在一定混杂现象,概而言之,主要有两种情况:一类是基本为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混杂著录,例如,汉·不著名氏《汉杂事秘辛》(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别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刘肃《大唐新语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吴兢《开元升平源》(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崇文总目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高彦休《阙史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国史经籍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卢肇《逸史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五代·刘氏《耳记》(《郡斋读书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宋·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(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别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元·刘祁《归潜志》(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别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明·焦竑《玉堂丛语》(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别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明·赵弼《效顰集》(《百川书志》著录“小史”,《千顷堂书目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明·王世贞《觚不觚录》(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“别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。

一类是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、“传记”三者混杂著录,主要有佚名《穆天子传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汉·(旧题)班固《汉武帝故事》(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晋·葛洪《西京杂记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百川书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晋·王嘉《王子年拾遗记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百川书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颜师古《大业拾遗记》(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百川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张鷟《朝野僉载》(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(《崇文总目》《百川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不著名氏《玉泉子》(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冯翊子《桂苑丛谈》(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唐·郑繁《开天传信记》(《百川书志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崇文总目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五代·王仁裕《王氏见闻集》(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五代·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(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五代·尉迟偓《中朝故事》(《直斋书

<sup>①</sup> [明]陈言:《颖水遗编》,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7年,第31页。

录解题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五代·刘崇远《金华子》(《崇文总目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、宋·钱易《南部新书》(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传记”,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杂史”,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“小说”)。

“杂史”类著作本身就属“率尔而作”“体制不经”之作,许多作品载录的内容非常驳杂,不可避免地收录了一些志怪、琐事等“小说”性质的作品。在历代公私书目中基本归入“杂史”类的著作中,部分作品含有“小说”性质内容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杂史类”之《弁山堂别集》提要:“其盛事奇事诸述,颇涉诙谐,亦非史体。”<sup>①</sup>《五代史补》提要:“此书虽颇近小说,然叙事首尾详具,率得其实。”<sup>②</sup>《钱塘遗事》提要:“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,故颇与《鹤林玉露》《齐东野语》《古杭杂记》诸书互相出入。”<sup>③</sup>《二申野录》提要:“是编采录明代妖异之事,编年纪载。始于洪武元年戊申,终于崇祯十七年甲申,故以‘二申’为名。与《明史·五行志》亦多相合。其诞者则小说家言也。”<sup>④</sup>对于“杂史”中的部分“小说”作品,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也应进一步扩大视野,将其纳入其中。在历代公私书目基本归入“小说”类的著作中,部分作品中也会含有“杂史”性质内容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甲申杂记·闻见近录·随手杂录》提要:“三书皆间涉神怪,稍近稗官,故列之小说类中。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,一切贤奸进退,典故沿革,多为史传所未详,实非尽小说家言也。”<sup>⑤</sup>对于“杂史”“小说”相互混杂的作品,目录学家一般都采取“姑举其重”的原则来归类。不过,目录学家在类属划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,依然会遇到许多困难。面对同一部作品,不同的目录学家对其题材性质和功用价值有不同的判定,有人认定为无关政教的琐碎之事,有人则认定为事关朝政军国,有人认定其以“杂史”为主,有人则认定其以“小说”为主,种种歧意混淆,实在难以避免。

## 二

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的文类混杂,应主要源于两者存在诸多相通之处。

从文类性质上来看,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都属于“史之流别”,都属有别于正史的野史、稗史之类。从史部类目体系来看,“杂史”是与“正史”“编年”“霸史”“实录”“起居注”等官方史著相对立的私家载记之“野史”,多由各记见闻而成,率尔而作,内容驳杂、体例不纯,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杂史小序”：“其属辞比事,皆不与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似。盖率尔而作,非史策之正也。”<sup>⑥</sup>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经籍考二十二》称：“杂史、杂传,皆野史之流,出于正史之外者。”<sup>⑦</sup>《宋三朝志》曰：“杂史者,正史、编年之外,别为一家。”<sup>⑧</sup>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“杂史类序”：“前志有杂史,盖出纪传编年之外,而野史者流也。”<sup>⑨</sup>“传记类序”自注：“杂史、传记,皆野史之流。”<sup>⑩</sup>从命名角度而言,“杂史”之“杂”主要指其内容、体裁之兼包众体、繁杂多样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杂史类叙”：“盖载籍既繁,难于条析。义取乎兼包众体,宏括殊名。故王嘉《拾遗记》《汲冢琐语》得与《魏尚书》《梁实录》并列,不为嫌也。”<sup>⑪</sup>以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为标志,“小说家”确立起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的义界,“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,国家兴灭终始,僭窃伪乱,史官备矣。而传记、小说,外暨方言、地理、职官、氏族,皆出于史官之流也。”<sup>⑫</sup>笑花主人《今古奇观序》：“小说者,正史之余也。”<sup>⑬</sup>

从编撰方式来看,“小说”(主要是笔记体)与“杂史”大都属载录闻见或传闻而成,不少内容真虚莫

①②③④⑤⑪ [清]永瑢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466、464、466、491、1193、460页。

⑥ [唐]长孙无忌等撰:《隋书·经籍志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55年,第46页。

⑦⑧ [元]马端临撰:《文献通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647页。

⑨⑩ [明]焦竑辑:《国史经籍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67、100页。

⑫ 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编:《二十五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,1986年,第4282页。

⑬ [明]笑花主人:《今古奇观序》,[明]抱瓮老人:《今古奇观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印版,第1页。

测。关于“杂史”，《隋书经籍志》“杂史小序”：“博达之士，愍其废绝，各记闻见，以备遗亡。”<sup>①</sup>《郡斋读书志》“杂史类”之《汲冢周书》十卷：“以司马迁之博闻，犹采数家之言，以成其书，况其下者乎。亦有闻见卑浅，纪录失实，胸臆偏私，褒贬弗公，以误后世者，在观者慎择之而已矣。”<sup>②</sup>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经籍考二十二》：“体制不纯，事多异闻，言或过实。”<sup>③</sup>明代王世贞：“野史之弊三：一曰挟郗而多诬，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，寄雌黄于睚眦，若《双溪杂记》《琐缀录》之类是也；二曰轻听而多舛，其人生长闾阎间，不复知县官事，谬闻而遂述之，若《枝山野记》《翦胜野闻》之类是也；三曰好怪而多诞，或创为幽异可愕，以媚其人之好，不核而遂书之，若《客座新闻》《庚巳编》之类是也。”<sup>④</sup>关于“小说”，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四《辨证二蜀道难》：“盖小说所记，各得于一时见闻，本末不相知，率多舛误，皆此文之类。”<sup>⑤</sup>洪迈《夷坚支丁序》：“稗官小说家言，不必信固也。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。”<sup>⑥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剧谈录》提要：“然稗官所述，半出传闻，真伪互陈，其风自古，未可全以为据，亦未可全以为诬。”<sup>⑦</sup>

在取材范围上，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在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之琐细轶事方面存在一定交集。相对于“正史”之外的其他史部流别而言，“杂史”载录之内容与“正史”最为相关，多事关庙堂国政、人事善恶，其中，有部分内容属各类历史人物之琐细的轶事，如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将“杂史”进一步区分为“事实之属”“掌故之属”“琐记之属”，其中“琐记之属”即属载录各类历史人物与庙堂国政等距离较远的琐言轶事。“小说”也有一类作品为载录历史人物轶闻琐事的“杂录”“杂事”等，例如，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》：“小说家一类，又自分数种：……一曰杂录，《世说》《语林》《琐言》《因话》之类是也。”<sup>⑧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小说家”序：“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；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”<sup>⑨</sup>“杂录”“杂事”主要指载录历史人物逸闻琐事者。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中此类性质的作品最易相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小说家杂事之属”案：“纪录杂事之书，小说与杂史，最易相淆。诸家著录，亦往往牵混。”<sup>⑩</sup>

历代公私书目中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混杂著录者，所录之事多关朝政、有裨劝戒，例如，《郡斋读书志》之《大唐新语》提要：“辑唐故事，起武德止大历，分为三十类。”<sup>⑪</sup>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之《明皇杂录》提要：“杂记明皇时事。”<sup>⑫</sup>其同时被混杂归入“小说家”，或因其中有少部分“小说”性质的内容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大唐新语》提要：“所记起武德之初，迄大历之末，凡分三十门，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。……故《唐志》列之杂史类中。然其中谐谑一门，繁芜猥琐，未免自秽其书，有乖史家之体例。今退置小说家类，庶协其实。”<sup>⑬</sup>或因其中所录之事过于琐细，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四朝闻见录》提要：“惟王士禛《居易录》谓其颇涉烦碎，不及李心传书。今核其体裁，所评良允。故心传书入史部，而此书则列小说家焉。”<sup>⑭</sup>《玉堂丛语》提要：“是编仿《世说》之体，采摭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，分条胪载。”<sup>⑮</sup>《唐阙史》提要：“然所载如周墀之对文宗，崔阍之对宣宗，郑薰判宦官之荫子，卢携之议镇州，皆足与史传相参订。李可及戏论三教一条，谓伶人不当授官，持论尤正。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，刘蛻辨齐桓公器单长鸣非姓单诸事，亦足以资考证，不尽小说荒怪之谈也。”<sup>⑯</sup>相比较而言，“杂史”与“小说”混杂著录者数量较少，主要因“杂史”载录之内容与“正史”最为相关、在史部门类中的地位较高，多事关庙堂国政、人事善恶，与“小说”之距离较远。

历代公私书目中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“传记”三者混杂著录者，从性质上来说，多同时具有“杂史”“传记”“小说”三种文类的规定性，即事关庙堂国政、人事善恶，或近或远、或大或小，但或含有部分鬼神怪

① [唐]长孙无忌等撰：《隋书经籍志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55年，第46页。

②⑪ [宋]晁公武：《宛委别藏本郡斋读书志》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69、172页。

③ [元]马端临撰：《文献通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647页。

④ [清]王世贞：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（明代论著丛刊），台北：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76年，第3429—3430页。

⑤ [宋]沈括：《梦溪笔谈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29页。

⑥ 丁锡根编：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98页。

⑦⑧⑨⑩⑪⑫⑬ [清]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210、1182、1204、1183、1201、1223、1210页。

⑭ [明]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82页。

⑮ [宋]陈振孙撰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：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44页。

异之事,或含有历史人物无关“朝政军国”的日常生活化的轶闻逸事、或载录事迹多依托虚构,例如,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之《次柳氏旧闻》提要:“记柳芳所闻于高力士者,凡十七条。上元中,芳谪黔中,力士徙巫州。芳从力士问禁中事。德裕父吉甫从芳子冕闻之。”<sup>①</sup>《郡斋读书志》之《中朝故事》提要:“记唐懿、昭、哀三朝故事,故曰‘中朝’。”<sup>②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杜阳杂编》提要:“此编所记,上起代宗广德元年,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,凡十朝之事,皆以三字为标目。其中述奇技宝物,类涉不经。”<sup>③</sup>《汉武故事》提要:“所言亦多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出入,而杂以妖妄之语。”<sup>④</sup>《桂苑丛谈》提要:“其书前十条皆载咸通以后鬼神怪异及琐细之事,后为史遗十八条。其十二条亦纪唐代杂事,余六条则兼及南北朝。”<sup>⑤</sup>

### 三

“小说”虽然由“杂史”“传记”分化而来,与其有着诸多相通、混杂之处,但作为不同的文类,却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类规定性。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“传记类”序:“杂史、传记皆野史之流,……若小说家与此二者易溷,而实不同,当辩之。”<sup>⑥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杂史类序”:“然既系史名,事殊小说。著书有体,焉可无分。”概言之,“小说”与“杂史”文类间的畛域区分主要体现为功用价值定位和题材取向上。

在功用价值定位方面,“小说”以“广见闻”“资谈助”“供谈啁”为主,而兼有一定的“寓劝诫、资考证、助文章”,而“杂史”以“补阙遗”“备遗忘”“存掌故”“资考证”为主。

在历代公私书目之史部类目体系中,“杂史”一般仅列“正史”“编年”“霸史”“实录”等官修史著之后,因其具有十分重要的“备国史所未备”“广见闻”“存掌故”“资考证”,为正史编撰提供素材的史学价值,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经籍考二十二》:“然籍以质正疑谬,补缉阙遗,后之为史者,有以取资,如司马迁采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,不为无益也。”<sup>⑦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史部总叙”:“史之为道,撰述欲其简,考证则欲其详。……又称光作《通鉴》,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,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家。”<sup>⑧</sup>“杂史类叙”:“要期遗文旧事,足以存掌故,资考证,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。”<sup>⑨</sup>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“史汉不同处”条:“一代修史,必备众家记载,兼考互订,而后笔之于书。观各史艺文志,所载各朝文士著述,有关史事者,何啻数十百种。当修史时,自必尽取之。”<sup>⑩</sup>

从史家的立场来看,正史编撰虽然也需要“遍阅旧史,旁采小说”,“并小说亦不遗”,但是相对于包括“杂史”在内的史部诸门类而言,“小说”虽然部分内容具有一定史学价值,但还是很低的,与“杂史”相比较具有明显的高下之分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子部总叙”称:“稗官所述,其事未矣,用广见闻,愈于博奕,故次以小说家。”<sup>⑪</sup>“杂史类序”称:“若夫语神怪,供谈啁,里巷琐言,稗官所述,则别有杂家、小说家存焉。”<sup>⑫</sup>所以,在古人心目中,“小说”之“寓劝诫”“补史之阙”等功用虽多被提及,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》:“小说者流,……其善者,足以备经解之异同,存史官之讨核,总之有补于世,无害于时。”<sup>⑬</sup>但这并非此类作品最为突出的主导价值功用。相对而言,“游心寓目”“广见闻”“助谈柄”等娱乐消遣功用更占主导地位,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一《夷坚志》:“稗官小说,昔人固为之者矣。游戏笔端,资助谈柄,犹贤乎已可也。”曾慥《类说序》:“小道可观,圣人之训也。……可以资治体,助名教,供谈笑,广见闻,如嗜常珍,不废异饌,下箸之处,水陆具陈矣。”<sup>⑭</sup>都穆《续博物志后记》:“小说杂记饮

① [宋]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題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47页。

② [宋]晁公武撰:《宛委别藏衢州本郡斋读书志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179页。

③④⑤⑧⑨⑪⑫ [清]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209、1206、1209、397、460、769、460页。

⑥ [明]焦竑辑:《国史经籍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00页。

⑦ [元]马端临撰:《文献通考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647页。

⑧ [清]赵翼著,王树民校证:《廿二史劄记校证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4页。

⑨ [明]胡应麟:《少室山房笔丛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1年,第283页。

⑩ [宋]曾慥: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类说》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88年,第6页。

食之珍错也,有之不为大益,而无之不可,岂非以其能资人之多识而怪僻不足论邪!”此外,“小说”多为诗文所取材、征引,故“有助文章”也是派生出一种重要功用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《西京杂记》提要:“其中所述,虽多为小说家言,而摭采繁富,取材不竭。李善注《文选》、徐坚作《初学记》已引其文,杜甫诗用事谨严,亦多采其语。词人沿用数百年,久成故实。”<sup>①</sup>《海内十洲记》提要:“其词条丰蔚,有助文章。”<sup>②</sup>《酉阳杂俎》提要:“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,荒渺无稽之物,而遗文秘籍,亦往往错出其中,故论者虽病其浮夸,而不能不相征引。”<sup>③</sup>

其次,在题材取向方面。相对于“正史”之外的其他史部流别而言,“杂史”载录之内容与“正史”最为相关,多事关庙堂国政、人事善恶,如《隋书经籍志》“杂史小序”:“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。”<sup>④</sup>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八《传记类》“《黄帝内传》一卷”:“《艺文志》以书之纪国政得失、人事美恶,其大者类为杂史。”<sup>⑤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杂史类叙”:“大抵取其事系庙堂,语关军国。”<sup>⑥</sup>“杂史”应多为与“正史”之人物、事件相关的历史记载。

“小说”(主要是笔记体)的取材范围和题材类型大体可分为两类,一种为载录鬼神怪异之事的“杂记”“志怪”“异闻”“语怪”等,以神、仙、鬼、精、怪、妖、梦、灾异、异物等人物故事为主要取材范围;另一种为载录历史人物轶闻琐事的“逸事”“琐言”“杂录”“杂事”等,以帝王、世家、士大夫、官员、文人及市井人物等各类人物无关“朝政军国”的日常生活化的轶闻逸事为主要记述对象。<sup>⑦</sup>相对而言,述怪语异、搜神记鬼几乎成为判定“小说”的一种标准,载录鬼神怪异之事者最容易与“杂史”相区别开来,如冯镇峦《读聊斋杂说》:“千古文字之妙,无过《左传》,最喜叙怪异事,予尝以之作小说看。”<sup>⑧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小说家类叙”:“然屈原《天问》,杂陈神怪,多莫知所出,意即小说家言。”<sup>⑨</sup>《山海经》提要:“书中序述山水,多参以神怪……核实定名,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。”<sup>⑩</sup>“孝经类”案:“虞淳熙《孝经集灵》,旧列经部。然侈陈神怪,更纬书之不若。今退列于《小说家》。”<sup>⑪</sup>

载录历史人物轶闻琐事的题材类型则较易与“杂史”相混淆,两者的主要区别为:“小说”所记“琐闻佚事”过于琐细,多无关“朝政军国”,无关“善善恶恶”之史家旨趣,如《欧阳修集·居士外集》卷十九《与尹师鲁第二书》:“今若便为正史,尽宜删削,存其大要,至如细小之事,虽有可纪,非干大体,自可存之小说,不足以累正史。”晁载之《续谈助·殷芸小说跋》:“右钞殷芸小说,其书载自秦汉迄东晋江左人物,虽与诸史时有异同,然皆细事,史官所宜略。又多取刘义庆《世说》《语林》《志怪》等已详事,故钞之特略,然其目小说,则宜尔也。”<sup>⑫</sup>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八:“《艺文志》以书之纪国政得失、人事美恶,其大者类为杂史,其余则属之小说。”<sup>⑬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小说家杂事之属”案:“纪录杂事之书,小说与杂史,最易相淆。诸家著录,亦往往牵混。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;其参以里巷闲谈、词章细故者,则均隶此门。”<sup>⑭</sup>《书目答问》:“以上杂史类琐记之属(注):主记事者,入此类。多参议论、罕关政事者,入小说。”<sup>⑮</sup>

这种区分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相关著作提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:《南唐近事》提要区分“杂史”之《江表志》和“小说”之《南唐近事》、《四朝闻见录》提要区分“杂史”之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和“小说”之《四朝闻见录》、《癸辛杂识》提要区分“杂史”之《齐东野语》和“小说”之《癸辛杂识》、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》提要区分“杂史”之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》和“小说”之《皇朝事实类苑》。

(责任编辑 周 萍)

①②③⑥⑨⑩⑪ [清]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182、1206、1214、460、1182、1205、268、1204页。

④ [唐]长孙无忌等撰:《隋书经籍志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55年,第46页。

⑤⑬ [宋]晁公武:《郡斋读书志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241页。

⑦ 参见拙文《论“笔记体小说”之基本文体观念》,《浙江学刊》2011年第3期。

⑧ [清]蒲松龄著,张友鹤辑校:《聊斋志异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9页。

⑫ 晁载之:《续谈助(丛书集成初编)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87页。

⑮ [清]张之洞:《书目答问》(国学基本丛书)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64页。